

J O D I P I C O U L T

说故事的人

THE STORYTELLER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支撑我活下来的故事。——

[美] 朱迪·皮考特 著

苏莹文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J O D I P I C O U L T

说故事的人

THE STORYTELLER

[美] 朱迪·皮考特 著

苏莹文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故事的人 / (美) 皮考特著; 苏莹文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8

ISBN 978-7-5502-5147-2

I. ①说… II. ①皮…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4068号

THE STORYTELLER

by Jodi Picoult

Copyright © 2013 by Jodi Picoul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mily Bestler Books/Atria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5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5-2250

说故事的人

作者: [美] 朱迪·皮考特

译者: 苏莹文

责任编辑: 王巍

选题策划: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约编辑: 周墨 杨菊蓉

封面设计: 陈艳丽

版式设计: 陈宇婕

责任校对: 绳刚 张新元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11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2次印刷

字数 375千字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16印张

ISBN 978-7-5502-5147-2

定价: 5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致 谢

我以西蒙·维森塔尔的《向日葵》当作本书的开端。维森塔尔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的俘虏，有一天，他被带到了一名垂死的党卫队士兵床前。这个士兵想忏悔，而且想寻求一名犹太人的宽恕。维森塔尔发现，他所面对的这个道德难题，是对于大屠杀受害与加害双方牵涉的众多哲学和道德分析的起点。这让我开始想，如果有人在几十年之后，对一名犹太俘虏的孙女提出同样的要求，情况会如何发展。

要以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违反人权罪为基础来写作小说，是一件让人却步的任务。原因是，就算你写的是虚构小说，但写出的正确细节，俨然是对幸存者以及不幸受害者的敬意。有了下面许多人的协助，我才能够写出活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塞奇，以及活在过去的敏卡。

我要感谢马丁·菲利普教我如何烘焙，并且让我度过写作事业中最美味的课程。感谢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又一页书店的伊丽莎白·马丁教我如何以最恶毒的意图烘焙。

感谢凯蒂·戴斯蒙德告诉我许多天主教学校的轶事趣闻。感谢艾莉森·索耶教会我许多塔雅在舞蹈时用到的专有名词。感谢苏珊·卡朋特让我知道哀伤辅导小组的成员如何互动。感谢亚历克斯·怀挺，

法兰克·莫兰和里斯·格谢特回答我有关基础法律、执法相关，以及战争法庭的问题。

写作这本书的期间，我拍卖了书中一个角色的名字，来为同性恋公民权团体GLAD募款。感谢玛丽·德安吉利斯的慷慨，也感谢她提供她的名字给塞奇最好的朋友使用。

司法部人权暨特侦小组政策及策略部门的负责人伊莱·罗森鲍姆是真实生活中的纳粹猎人，感谢他在屠杀恶龙之余还抽空提供数据，让我知道他的工作内容，并以他的经验来创造出书中角色。知道仍然有像他这样的人不屈不挠地做这些事，我心中有无数的感激。（而且我要感谢他容许我书中的历史研究员以超乎寻常的速度从国家档案中心取得资料。在真实生活中，这要花好几天时间，而不是几分钟。）

我要感谢为我上了第一堂“第三帝国”课程的保罗·韦译，感谢施特菲·格拉德贝克让我对德国概略有认识。我尤其要感谢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博物馆的资深历史研究员彼得·布莱克博士，他容我提出无数问题，以超凡的耐心纠正我的错误，帮助我架构出纳粹的养成之路，并且阅读了初稿中的段落，以确定史实的正确性。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没有他的投入，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我要感谢艾米丽贝斯特勒图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皮考特小组成员：卡洛琳·里迪、朱迪恩·科尔、凯特·切特鲁洛、卡洛琳·波特、克莉丝·洛雷达、珍妮·李、加里·尤尔达、丽莎·凯姆、瑞秋·朱格施沃特、迈克尔·塞莱克，以及许多一路上帮助我成长的人。感谢杰出的公关团队：戴维·布朗、瓦莱丽·维尼克斯、卡米尔·麦克达菲、凯瑟琳·卡特·兹雷莱克，你们的表现专业又优秀，让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对新书充满了热忱。感谢艾米莉·贝斯特勒，我珍视你的指导、友谊、对我作品的信任，以及你找出最佳购物

网站的绝佳能力。

劳拉·格罗斯，祝你周年快乐。感谢你提供的安息日聚会数据，感谢你让塞奇融入你的生活，我特别要感谢你担任我的私人助理。

感谢我父亲，我们小时候，他真的曾经用唐老鸭的声音来主持逾越节的仪式。而我的母亲，我早知道她非同小可，但没想到在我问她是否可以帮我找到几名大屠杀幸存者之后，她竟然可以在一天之内开出附电话号码的名单。她为我的这本书铺好了路，对此我真心感激。

然而，我最需要感谢的是这些幸存者。在搜集本书资料时，我有机会和这些令人赞叹的大屠杀幸存者谈话，他们在隔离区、乡下、城里，以及集中营里的亲身经历提供了我想象的空间，并且让我创造出敏卡这个角色。尽管敏卡经历了与幸存者和纳粹猎人叙述中相似的恐怖经历，但这个角色并非来自我见过或听闻过的人，而是虚构出来的人物。感谢为我敞开家门和心胸的幸存者，你们愿意和我分享你们的故事，是我的荣幸。感谢你，桑迪·朱克曼，将你母亲的手稿提供给我。感谢西尔维亚·格林提供我大屠杀时期的经历。感谢同为作家的格尔达·韦斯曼·克莱因给我的鼓励和创意。感谢伯尼·舍尔，谢谢你诚实慷慨地把你的故事告诉我。感谢马尼亚·塞林杰，谢谢你的勇气，让我翻索出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并且成为我珍视的朋友。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蒂姆、凯尔（你很有远见，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学了德文）、杰克以及萨曼莎（谢谢你帮我搜集了几个吸血鬼的故事）。你们四个是我生命的故事。

献给我的母亲简·皮考特

因为你让我学会没有什么是比一个家更重要的，
而且至今已过二十年，你又再度验证了这件事。

父亲把葬礼的细节托付给我。“安妮雅，”他说，“我葬礼上不要看到威士忌，要用顶级的黑莓酒。还有，提醒你：记得要大家都别哭，跳舞就好。在他们把我棺木吊进墓穴时，我要喇叭响亮吹奏，还要白色蝴蝶。”我父亲就是这么有个性。他是村里的面包师傅，每天除了为居民烘烤面包，他还会特别帮我烤一个与众不同的面包。他在面团里加入肉桂和浓郁的巧克力，为我烤出这个外形像公主小皇冠的面包。其中的秘密配方，他说，是他对我的爱。他的爱足以让这个面包比我尝过的任何东西都美味。

我们住在村郊，这个村子小到每个居民彼此都认识，叫得出名字。我家主屋的墙壁是以卵石砌成，屋顶用的是干草，而父亲用来烤面包的壁炉同时提供了小茅屋温暖。我在后院的小花园里种了一些豆子，当父亲拉开砖炉小门，把长铲子伸进炉里拉出一条条外皮烤得香酥的面包时，我常坐在厨房桌边剥豆荚，看着炉里红色的余烬勾勒出他汗湿背心下结实的背肌线条。“我不想在夏天办葬礼，安妮雅，”他老爱说，“你千万要让我死在一个吹着清风的凉爽日子里，而且要在候鸟南飞之前，这样，它们才可能为我欢唱。”

我假装记下他的叮嘱。我不介意这类触及死亡的话题，我觉得父亲强壮得很，也不相信他这些愿望真会有实现的一天。村里有些人对于我们父女之间这种互动、拿这种会发生的事实开玩笑，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我母亲在我襁褓时便已经过世，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

那天正好是我十八岁生日。之前曾经有几个农夫抱怨过，他们出门喂鸡时，看到鸡舍里只剩下一摊摊沾了血的鸡毛，要不就是牛犊被啃得只剩骨头和嗡嗡作响盘旋在上的苍蝇。“是狐狸。”这是巴鲁克·贝勒的看法。他是税务官，他的大宅在村中广场的尽头，宛如皇室贵族佩戴在脖子上的珠宝。“也可能是野猫。上缴积欠的税金，那么你们就能受到保护。”

他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来到我家小屋。我所谓的毫无准备，是指我们没拉上门，熄掉炉火，假装自己不在家。当时父亲正忙着把面团揉成心形——他在我生日当天一定会烤心形面包，让全村居民都知道这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巴鲁克·贝勒冲进厨房，举起柱顶镶金的拐杖往工作台上一敲。面粉随着他的动作飘散，像是一朵云，而在粉尘落定之后，我低头看到父亲手中的面团成了破碎的心。

“拜托，”我那从来不求人的父亲说，“我知道我保证过，但生意实在不好。如果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你拖欠税款，艾米，”贝勒说，“我有权扣押处理你这个破烂小地方。”他往前靠上来。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父亲并非举世无敌。“但因为我不生性慷慨，是个大好人，所以我愿意宽限你到这个周末。到时候如果你缴不出钱来，嗯，我就不保证会发生什么事了。”他像拿武器一样拿起拐杖，双手握住拐杖两端，“最近发生了不少……不幸的事件。”

“所以我们的生意才会那么差，”我啜嚅地说，“大家不上市场，因为他们怕外头的野兽。”

巴鲁克·贝勒转过头来，仿佛首次发现我的存在。他上下打量我，从我扎成麻花辫的深色头发一路看到我穿着皮靴的双脚；我这双靴子破了好几个洞，用厚厚的法兰绒补了起来。他的目光让我不由自主

主地打战。警卫队长达米安在我走过村子的广场时也会盯着我看——达米安像只猫，把我当奶油看，但贝勒的目光不同。不，贝勒像是在打量财物，似乎想评估我值多少钱。

他伸手越过我的肩膀，从我背后的网架上拿起一个刚出炉正待冷却的心形面包。他把面包夹在胳膊下，说：“我拿这个当抵押。”接着大刺刺地走出小屋，偏偏不随手关上门。

父亲看着他离开，耸了耸肩。他抓起另一把面粉，又开始揉面团。“别管他。他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总有一天，我会在他的坟上起舞。”他转头看着我，露出微笑，脸色缓和了下来，“这让我想到，安妮雅。我葬礼上要安排列队欢送，先由孩子们沿路撒下玫瑰花瓣，后面跟着一群漂亮女士，让她们打着像温室花朵一样的漂亮阳伞。接着是我的灵车，我要四匹——不——五匹雪白的马来拉车。然后呢，我希望让巴鲁克·贝勒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负责清理马粪。”他仰着头大笑，“当然啦，除非他先死。而且越早越好。”

我父亲把葬礼的细节托付给我……可是到了最后，我却来不及为他办后事。

第一部

在一个不再将人视为人，而且再三证明人已非人的世界中，我什么也不信。

——西蒙·维森塔尔，《向日葵》

塞奇

这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四，邓博斯基太太带着她过世的丈夫来到辅导小组。

时间才刚过下午三点，这时多数人都还拿着纸杯，正要去倒难喝的咖啡。我带来一盘糕点，因为上星期斯图尔特告诉我，他之所以愿意继续回到“伸手助人协会”来参加哀伤辅导疗程，完全是为了我烤的奶油胡桃松糕。就在我摆放糕饼的时候，邓博斯基太太怯生生地朝她抱在手上的瓮子点了个头。“这是贺伯，”她告诉我，“贺伯，这是塞奇，是我向你提过的烘焙师傅。”

我愣愣地站着，低头——这是我的一贯动作——让头发遮住我左侧脸颊。我相信，和某人被火化的另一半打招呼一定有特定礼节，但是我不知该怎么做。我应该说你好？还是握握骨灰坛的把手？

“哇。”最后，我终于发出声音。这个小团体的规则虽然不多，但都不容动摇：当个好听众，不要妄下评断，不要为别人的哀伤设定上限。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毕竟，我到这里来也将近三年了。

“你带了什么东西过来？”邓博斯基太太问道。这时我才明白她为什么会把丈夫的骨灰坛带过来。小组上次见面时，我们的辅导员玛吉建议大家分享回忆，无论我们失去的是什么都可以。我看到茜拉抓着一双手织的粉红色小袜子，她抓得好紧，连指节都发白。埃塞尔拿

的是电视遥控器，而斯图尔特带来——这不是第一次了——在他第一任妻子过世后复制下来留念的青铜面具。这个面具已经在我们这个辅导小组出现过好几次，在这天邓博斯基太太把贺伯带来之前，斯图尔特的青铜面具可说是让我觉得最毛骨悚然的东西。

在我结结巴巴想开口回答之前，玛吉已经召集好了小组的成员。大伙儿各自拉了把折叠椅，围成一圈。座位间隔不远，近到足以让我们可以拍拍某人的肩膀，或是握住对方的手，以表示支持之意。小圈圈的中央放着一盒玛吉每次疗程都会带来的面纸，以备不时之需。

通常玛吉会用大范围的问题来开场，比如：9·11事件发生时，你们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可以引导大家谈论起共有的悲剧，有时候，这么做会让人更容易谈及个人的伤痛。但尽管如此，小组里总有人不开口说话。我甚至曾经在好几个月之后，才听到某个新成员的声音。

然而，玛吉在今天直接聊起我们带来的纪念品。埃塞尔举起手。“这是伯纳德的，”她用拇指摩擦着电视遥控器，“我本来不想让遥控器变成他专用的东西，天知道，我试过至少上千次，想拿开这个遥控器。我连对应的电视都没留下来。但是我好像没办法扔掉这东西。”

埃塞尔的丈夫还活着，但是他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认识她。人会因为各式各样由小至大的失落而痛苦。你会遗失钥匙、眼镜或失去童贞。你可能会昏了头，丧失良心甚或理智。你会搬出自己家，住进可提供协助的机构，会有子女迁居海外，或是，你必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配偶逐渐进入痴呆的状况。失去，不仅限于死亡，而哀伤是灰暗的情绪，会以各种形态出现。

“我丈夫也霸占遥控器不放，”茜拉说，“他说，那是因为女人掌控了遥控器以外的一切。”

“其实那是一种本能，”斯图尔特说，“男人大脑里控制领土概念的区块大于女人。我在约翰·泰斯的节目里听来的。”

“所以经他这么一说，就成了神圣不可推翻的定论？”乔瑟琳翻了个白眼。她和我年龄相当，都二十来岁。而和我不同的，是她对任何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缺乏耐心。

“谢谢你和我们分享你的纪念品。”玛吉迅速插话，“塞奇，你今天带了什么东西过来？”

大家全看过来，我感觉到自己的脸红了。虽然我认识辅导小组里的每一个人，尽管我们围成互信的圆圈，但这样在众人审视的目光下剖析自己，仍然让我痛苦，皮肤上的伤疤，犹如海星般紧攀着我的左眼皮和脸颊，甚至比往常更紧绷了。

我甩动遮住眼睛的刘海，拉出无袖背心下那条挂着我母亲结婚戒指的链子。

母亲过世至今已经三年了，我当然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想到她，仍然有种被利刃刺进肋间的感觉。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成了唯一从一开始便留在这个辅导小组里的成员。其他人来这里是为了治愈，而我则是为了惩罚自己。

乔瑟琳举起手。“我对那东西真的有意见。”

我的脸更红了，我以为她指的是我，接着才发现，她一直盯着邓博斯基太太放在腿上的骨灰坛。

“太让人反胃了！”乔瑟琳说，“不该带过世的东西出席，我们应该要带的是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他不是东西，他是人。”邓博斯基太太说。

“我不想火化，”斯图尔特若有所思地说，“我做过死于火灾的噩梦。”

“新闻快报：在你被送进焚化炉之前，你早就死了。”乔瑟琳说。邓博斯基太太哭了出来。

我伸手抽出面纸递给她。玛吉温和但坚定地提醒乔瑟琳，辅导小组是有规矩的，这时候，我起身走向走廊尽头的洗手间。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认为“失去”会通向正面的结果。我母亲曾经说过，她就是这样才遇到了一生的至爱。她把皮夹忘在餐厅里，副主厨看到之后，找出了她的联络方式。当他打电话给她时，她不在家，她的室友帮忙留下口信。我母亲回电，接电话的女人找来了我父亲。他为了归还皮夹约她见面，两人见面后，她发现他完全符合她所有的梦想……但她同时也知道，之前，当她打电话找他的时候，接电话的是个女人。

还好，那个女人是他的姐姐。

我十九岁那年，父亲心脏病发过世。三年后我失去了母亲，而唯一能让我自己接受的解释是：她终于能和他相聚了。

我走进洗手间，将盖住脸的头发往后拨开。

到了现在，我脸上凹凸不平的伤疤已经褪成了银色，伤口从我的脸颊一路划到眉毛旁边，像是丝质皮包的开口。只不过我的眼皮下垂，皮肤绷得太紧，一时间，你可能看不出我脸上有什么不对——至少我朋友玛丽是这么说的。但大家都看得出来，只不过太客气而没多说，除非这个人不满四岁又出奇的诚实，才会指着我的脸问他们的母亲，这位女士的脸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虽然创伤已经褪色，但是我眼里看到的仍然是意外刚过之后的模样：一道猩红扭曲、犹如闪电般的伤口撕裂我对称的脸孔。就这点而言，我猜，我和得了厌食症的女孩一样，体重不到四十五公斤，却觉得镜子里有个胖女人在回瞪自己。事实上这对我不仅仅只是个伤疤，